

阿朗小品

● 唐瑜 ●

● 海峡文艺出版社

阿朗小品

祖

● 唐瑜 ●
著

海峡文艺出版社

阿 郎 小 品

唐 瑜

*

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

(福州得贵巷27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

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6 5.777 印张 3 插页 90 千字

1986年1月第1版

1986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8,880

书号: 10368·123 定价: 0.95元



阮玲玉在一九三四年费穆编导的《香雪海》中



一九四七年清明在上海“广肇山庄”阮玲玉墓前

左起：唐瑜、蔡明、蔡楚生、蔡小云、陈曼云



潘汉年与董慧



孙师毅

杨丽坤在一九六二年刘琼
导演的《阿诗玛》中



杨丽坤、唐凤楼和他们的双生子，一九七九年在上海

序

魏绍昌

唐瑜同志早在三十年代初从写影评开始，编过电影刊物和报纸文艺副刊，但自抗战兴起之后，他东奔西忙地就不再写什么东西了。然而他从未脱离文艺界，抗战时期在重庆的“二流堂”，虽说吴祖光是头号代表人物，唐瑜却是实际上的“堂长”，也许正因为他停笔久矣的原故吧，其声名反而为他的“堂友”们所掩了。

当年的“二流堂”中，包括了文学、戏剧、电影、音乐、美术、翻译以及新闻出版等各方面的人才；他们大都已经成名，而且又很年轻，其中的吴祖光、丁聪和黄苗子在重庆且有“三神童”之称。而从当时他们的文艺作品和一贯表现来考察，显然都是成绩卓著的进步文艺阵容中的人士，其时他们中间虽还没有一个是

党员，但他们都象众星拱月般地紧密靠拢在夏衍等党内老同志的身边周围，这就足以表明当时他们对党的认识和态度了。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二流”这个名词来自延安的新型秧歌剧《兄妹开荒》之中，剧中的“二流子”从游手好闲到改邪归正，充分体现了党的教育和革命力量的伟大与正确。如果仅仅从吴祖光等当时的工作与生活比较自由散漫这一点与“二流子”的作风稍有类似而加以相提并论，毕竟是十分勉强的。我认为吴祖光等中意这“二流”两字，只能表示他们同革命前辈作家如夏衍同志等对照起来，自己都还年轻和不够成熟的自谦之意，而陕北的“二流子”终于能够改造成新人这一点，恰恰又与他们倾向革命有改造自己世界观的心愿是吻合贯通的。所以我看吴祖光等甘于接受这个出于开玩笑的称号，实质上还意味着当时他们对革命圣地新人新事的向往和追求。从而也可以看到，唐瑜当年为他的那些年轻单身而很有作为的朋友们解决住宿上的困难问题，实际上也是做了一件促进重庆进步文艺界人士团结互助的好事。至于这件好事过了二十年居然会掀起一次株连了一大片的

冤狱，那是谁也想不到。

腥风恶雨过去了，冤狱终于彻底平反澄清了。备受十年魔难折磨的唐瑜居然重新握起搁下整整四十年的笔来了，这倒也是谁也意想不到的。这本《阿朗小品》（阿朗是朋友们对唐瑜的昵称）中所收的二十多篇文章，就是他近几年内动笔的成果。书分甲、乙两辑，甲辑写的是悼念亡友和追忆往事；乙辑写的是牛棚经历和劫后见闻。前者注满了沉痛的哀思和切身的感受；后者洋溢着真挚而强烈的爱憎和激情，内容都非常充实精彩。据此足见老将的阅历丰富，功力深厚，一旦东山再起，出手便不同凡响。我认为这本书的出版，无论对作者或他的友好以及读者们来说，都会感到难得可贵，而且意味深长的。

1984年6月于上海

目 次

I 序

魏绍昌

甲 辑

3 追念郭老

9 怀念你，直到我们重相见

——悼徐冰同志

16 鲜花一束，乘风直上九霄

21 哀思和忆念

——潘汉年、董慧同志二三事

43 写给无名碑

——遥祭潘汉年、董慧

51 忆蔡楚生和陈曼云

80 忆孙师毅

88 和金焰相处的日子

99 记编副刊二三事

——并纪念孙师毅、蔡楚生、王尘无

113 杀阮玲玉者谁？

——黄色记者是凶手之一

117 话说“二流堂”

〔立此存照〕粉碎中国的裴多菲俱乐部

“二流堂”（南卫东）

乙辑

135 父·子·女

139 “公堂”志趣

142 落拓不羁

146 从“永唾不朽”想起

150 C野姑娘

157 抄家记

162 大牛棚

166 老放牛

174 团圆节

178 北京小景

北京改装

北京图书馆即景

北京仿膳的故事

路名的“革命”

《李慧娘》

《五更寒》

两只“骨灰盒”

业余华侨

打电话

“国服”

样板

195 上海杂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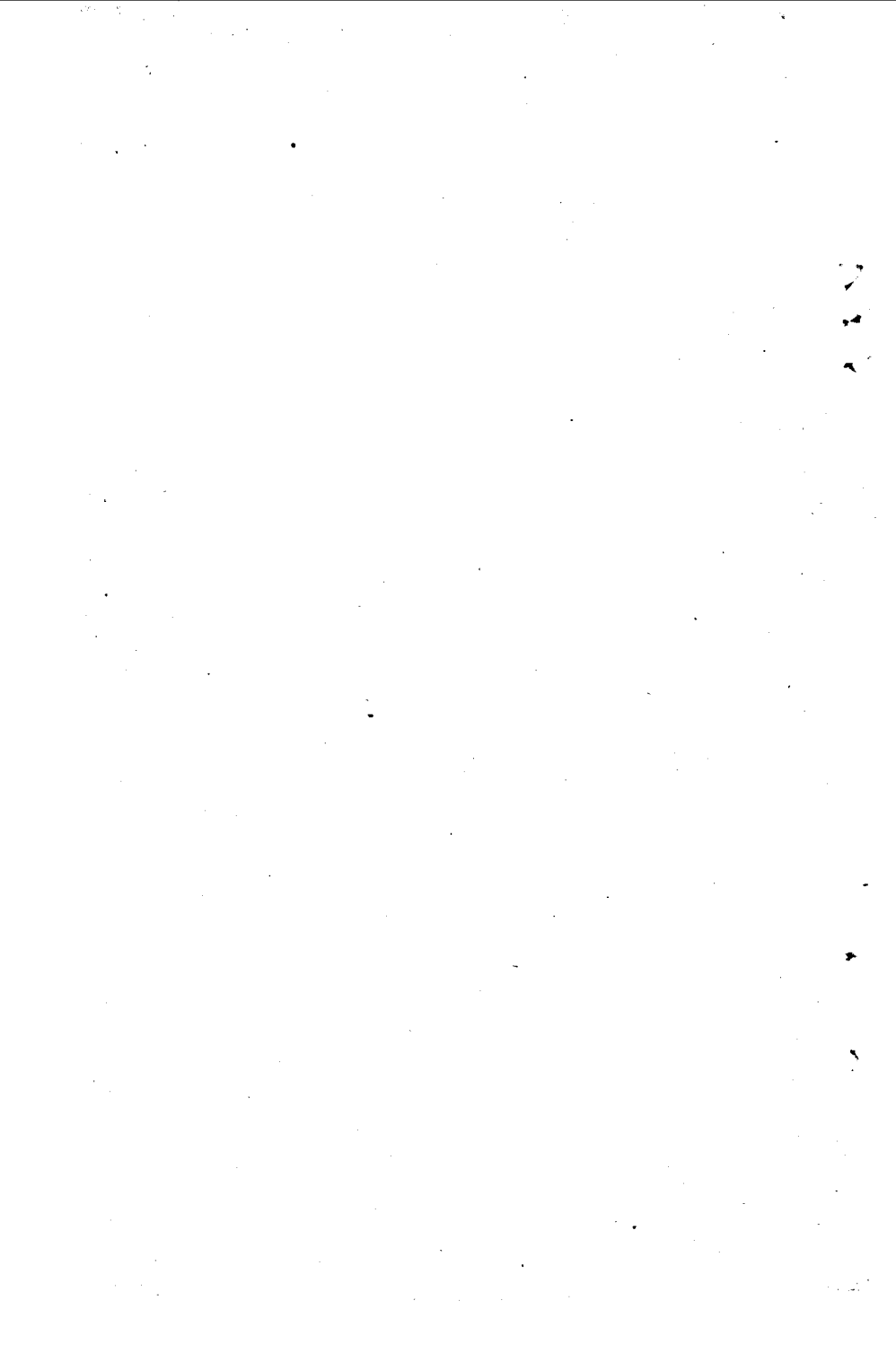
水

早酒

一日游

199 “阿诗玛”在上海

甲 輯



追念郭老

郭老和我们永别了，但郭老所赐予我的将永远铭记在我的心中。

我“认识”郭老是在一九二七年秋。一天早晨，远远地传来几声枪响，接着，街上人声鼎沸。这一天，汕头岭东《国民日报》异乎寻常的在第一版用红字登载了一篇署名郭沫若的文章——红军进入了汕头市。

尽管我那时只有十五岁，年幼无知，但对郭老的《女神》和译作《少年维特之烦恼》、《茵梦湖》还是倾慕备至，这么一个大诗人、大文学家竟是一个共产党！我也第一次“认识”了共产党。

不多时，红军撤离，全市弥漫着白色恐怖，我到处寻找郭老的书，但书店里的新书架上空无所有。在郭老的感召之下，这年冬天，

我离家出走，走向社会。

八·一三，上海响起了抗日的炮声，地下党办了一份宣传抗日的《早报》，夏衍约了孙师毅编辑新闻版，此时，我幸福地见到了郭老本人，他亲自为《早报》编副刊写稿，我荣幸地为他做版面的编排工作。随着战争的扩大，为适应抗日救亡宣传的需要，郭老又亲自筹划创刊《救亡日报》，他以奔放的热情不辞辛劳与艰险跑遍了各个战场，写下了无数激励人民斗志的文章与诗篇。在此同时，他通过北伐时期熟悉的一些老关系，动员了大批文化、戏剧工作者组成各种形式的抗日宣传队伍，我在他和夏衍的安排之下，参加了较早组成的“战地服务队”。在上海的西南远郊乡村的驻地，郭老又远道去探望我们，和全体队员亲切交谈，亲自审阅我们的抗日宣传节目。

第二年，战地服务队被解散了。我去武汉看郭老，按照他的指示，我到中国电影制片厂工作。武汉沦陷，又随厂到了重庆。这时候，《救亡日报》由夏衍同志主持在桂林复刊，郭老以他革命事业家的胸怀，为了扩大抗日宣传，他把他的稿费收入和生活费节余交给我出